DOI:10.15897/j.cnki.cn51-1046/g2.20240026.001

截屏何以被“信以为真”：一个传播符号学的考察[1)]

李玮　刘兴澳

摘要　截屏在人际交往和公共传播中得以广泛流通，取决于行动者对截屏“信以为真”的信念，即截屏的“本真性”。鉴于截屏的本质是“符号文本”，其“本真性”是一种解释结果，本文从传播符号学理论视野切入，将截屏的“本真性”看作“文本”“语境”与“解释者”三者互动作用的产物。首先，文本维度可显见的媒介技术和符号框架，分别以物质隐喻和视觉转喻的方式，使截屏被“感知为真”；其次，语境维度可感知的伴随文本和场合语境，通过互文指涉和语义框定，使截屏被“衍义为真”；最后，解释者维度可调用的个体成长经历和社群文化身份，通过经验接合和情感引导，使截屏被“认同为真”。

关键词　截屏；本真性；文本；语境；解释者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　李玮，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陕西西安 710127；刘兴澳，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127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截屏”（Screenshot），顾名思义，即有关“屏幕”（Screen）的“拍摄”或“镜头”（shot）。随着智能传播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过去“向外拍摄”的“摄影机”如今正在以一种“向内自拍”的“截屏”方式融入个体生活，让我们的日常行为在不知不觉中服膺于截屏的逻辑：看到字字珠玑的佳作时，截屏转发取代了执笔记录；在云端之上享受跨越时空的视觉盛宴时，时刻准备截屏的紧张感取代了赏景的松弛感。无论是截取以保存信息、展示以表征身份，还是传播以维系社交，截屏都提供了新的可能。同时，截屏还深度参与到社会公共事件中，建构着行动者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影响着行动者的行为。2021 年 8 月，《北京日报》一项调查显示，聊天截图是涉疫谣言的主要源头之一，其造假数在总调查样本中超过三成[1]。2023 年 5 月，据公安部网安局消息称，武汉一网民伪造“某商户辱骂外卖员”截图，引发群众不仅网暴商户，还对商铺实施线下“报复性”活动[2]。可见，截屏作为一种新的媒介文本形态与媒介实践，不仅在人际交往中生产着新的可能，还在网络空间中展现出公共性潜力。

截屏作为一种媒介实践对日常生活和公共交往的高度浸润，使得学界也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符号学进路研究”（22BXW003）。

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从媒介考古学视角出发考察截屏与过往媒介物之间的关联，发现截屏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用相机拍摄X光片的实践”[3]，60年代交互计算机出现之后，截屏实践从按下“相机快门”过渡到了“计算机按钮”[4]，其可供性也经历了从“可复制性、分享性”到“瞬间触发性”再到“可存储性”的变化[5]，总体上彰显了技术发展的“人性化”[6]趋势。二是，考察截屏媒介实践的功能与特点，发现截屏具有“空间转向”[7]的特点，具有告知信息、截取内容、存储和娱乐等功能[8]，能够充当人际交往的证据和平辈政治的载体[9]，帮助个体“突破圈层壁垒，促进知识流动”[10]，还能成为数字交往和信任关系的“凭据”且以档案的形式管理自我可见性[11]。三是，考察截屏实践在法律和伦理上的风险[12]，发现截屏实践潜藏着“权力异化”[13]“侵犯隐私”[14]“滋生谣言”[15]等风险。

前人研究如同一张网，编织出了我们对“截屏”的整体认知图景。既然是网，便有交汇，前人似乎都“默契”地承认了截屏具有被接收者“信以为真”的品质：首先，媒介考古学路径研究指出截屏“远比摄影和摄像等媒介所生成的信息具有更为广泛的证据性和传真性”[16]；其次，只有截屏被赋予“真实”的效力，才能够充当人际交往的凭证、获取信任的手段和平辈政治的载体；最后，截屏的法律和伦理风险离不开截屏所传递的“接近真实”的感受。简言之，只有截屏被认为传递了真实信息，上述的功能与作用才会发生、伦理与风险才会存在。而这，暗示了截屏的“本真性”。截屏的本真性，是“截屏信息依据想象中的情境被人们感知到的包含现实（reality）或真实（truth）的程度”，它源于信息的“准确性”与行动者的“感知和判断”[17]。截屏本真性的生成，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截屏被接收者“信以为真”。

遗憾的是，前人多数都“默契”地回避了对“截屏被‘信以为真’的品质缘何而来”这一关键问题的系统性解释，就像保罗·弗罗施（Paul Frosh）所说，我们只是“浏览”（look through）屏幕截图的内容，而几乎从不“查看”（look at）其运作机制[18]。杜璇、刘于思是少数关注到这一问题的学者，他们立足于截屏实践中的截取、保存与传播三大过程，极具启发性地探讨了截屏本真性何以建构的问题，而后指出：截屏实践采取了截取作为“框架”技术、保存作为瞬时记忆术、传播瓦解公私边界等本真性建构的差异化策略，促使截屏实践所鼓励的“表现真相”成为一种技术意识形态[19]。但这一探索更多的是将截屏置于人际交往情境中，忽视了截屏在公共交往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对截屏本真性建构的解析框架侧重于媒介技术角度，对截屏的文本类型、接收者的意义阐释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语境关照不足。此外，以学理思辨为主的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行动者生活实践的经验阐释。

综上，本真性何以建构的问题，是截屏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厘清这一问题，既能在理论上夯实截屏研究的基础，关照到由截屏引发的网络舆论事件深处的内在缘由，引导我们对截屏问题的探索从本体论走向认识论；又能在实践上提请人们反思深度媒介化时代下的媒介素养问题，而这关乎每一个体的媒介实践与媒介化生存。但鉴于截屏实践在人际交往与公共事件中的广泛存在，我们对“截屏何以被‘信以为真’”的探讨，第一，不能局限于微观的人际交往情境中来展开，而是需要将视线拓展到更大范围的公共场域之中；第二，不能满足于历时层面的过程性探讨，也需要在共时层面上寻求结构性解释。这是本论文的逻辑出发点。

二、理论进路与研究方案

（一）理论进路：传播符号学

既然截屏的本真性是行动者感知情境信息的结果，那就意味着，截屏在本质上是一种“携带意义等待感知解释”的符号文本，其传递何种意义以及能否让人“信以为真”，实际上“取决于接收者（解释者）的意义构筑方式”[20]。也即是说，截屏本真性的建构是一个传播符号

学的问题，它离不开符号文本的构筑与接收者的解释。需注意的是，符号文本必须是包含一定量符号的符号组合，解释者亦非生活于真空中，它们必然存在于特定的时空环境——“语境”中。由此，截屏的本真性作为一种解释结果，它是“文本”“语境”与“解释者”三者互动作用的产物。

首先，“文本”指的是截屏实践生成的视觉图像，它通常依赖于特定的媒介技术而显现，内部又由诸多符号要素所组成。“文本”作为外在形式存在于互动的表层，可以直接在视觉层面上被接收者捕捉，是可显见的。其次，在可显见的表层文本之下，“语境”作为文本发生的环境，能够确定文本的释义规则，锚定解释者的意义取向。赵毅衡教授将“语境”划分为伴随文本语境和场合语境，前者指被文本携带着，并参与意义构成的文本，是一种“内部”语境，后者指任何符号文本的释义规则都与特定的情景关系相连，这种情景或场合是一种“外部”语境[21]。“语境”作为环境氛围弥散于互动中层，不必然在视觉上显见，但可以被解释者轻松感知，进而影响到解释。最后，在可感知的中层语境之下，“解释者”处于接收端，他们可以结合自身经验展开解释。一方面，以“解释者”自身为媒介所串联起来的更为深远的成长经验、思维惯习和情绪能量等，构成了最隐蔽、最深层的解释者“元语言”，即个体成长经历，在有意无意间作用于解释，这体现为接收者在“历时”层面的积累与沉淀；另一方面，解释者所处的社会网络、群际关系等，构成了更广泛、更宏大的社群文化身份，常以情感为中介引导着解释，这体现为接收者在“共时”层面遭遇的结构性释义压力。它们作为解释资源潜藏于互动深层，既不显见于视觉表层，亦不足以被接收者轻松感知，而是需要作为解释者的个体主动或被动地调用它们。

由此，从文本维度可显见的媒介技术与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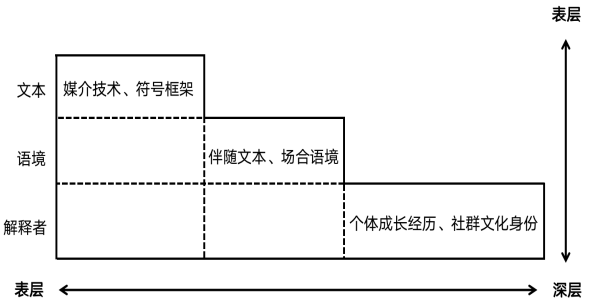

图 1　本真性建构的三个维度①

要素、语境维度可感知的伴随文本与场合语境，再到解释者维度可调用的个体成长经历与社群文化身份，为我们从表层到深层勾勒出了本真性建构的互动层次与解释结构（图 1）。若将它们看作通往“本真性”的三条释义之路，其间必然存在多条交叉的小道，即是说，彼此之间不存在一个明晰的边界，而是具有内在的对话关系：文本存在于语境和解释者中，语境中介着文本与解释者，解释者也需在特定语境中解释文本。综上，立足于“文本”“语境”和“解释者”三者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深入到每一个层面，去解释截屏文本的“本真性”何以建构的问题，亦即其缘何使人“信以为真”的问题。

（二）研究方案：经验主义补充主观阐释

如前述，本文的理论出发点是，将截屏生成的图像看作一种文本，试图从“文本”“语境”和“解释者”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去分析截屏文本“缘何使人‘信以为真’”。而截屏作为一种对个体生活浸润程度极高的日常实践，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惯习，因此，为了避免主观阐释的个体相对主义和形而上的纯思辨式理论分析，本文试图采用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所倡导的“经验主义替代阐释方案”。这一方法试图用经验主义来弥合主观主义阐释与客观主义真理之间的鸿沟，认为“经验主义既能够满足激发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神话的那些真实合理关切，同时又不像客观主义那样痴迷于绝对真理，也不像主观主义那样坚持想象

① 说明：图 1 中的“虚线”表示不同维度之间的边界不明晰，“实线”表示不同维度各自的意义边界。

力是完全不受限制的”[22]。为此，本研究以深度访谈法来获取经验材料，试图关照到截屏作为媒介实践在行动者日常经验生活中的意义，并以此呼应理论出发点，实现理论与经验的互益。

我们将访谈对象集中于那些曾有过将截屏文本看作真实（无论文本本身真假与否）的经历或自认长期使用截屏功能的个体，并通过问卷调查、网络公开招募和关系推荐的方式筛选出16位受访者（表1），通过30分钟以上不等的半结构式访谈获得第一手资料，对部分受访者进行了二次、三次的回访。访谈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涉及被访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以及对截屏的认识；第二部分主要涉及被访者过往使用截屏的经历，包括截屏经常被用来做什么、什么情况下会使用截屏等；第三部分主要涉及截屏在被访者眼中具有的真实性程度，以及被访者对人际交往和公共传播中截屏的看法。所有访谈通过线上语音或线下面谈进行，涉及隐私的部分均遵循学术伦理原则，予以技术处理。

表1 受访者信息表

序号	编号	身份	性别	年龄	访谈方式
1	SA	研究生在读	女	23	语音通话
2	SB	事业单位职工	男	25	面谈
3	SC	研究生在读	女	24	语音通话
4	SD	本科生在读	女	19	语音通话
5	SE	研究生在读	女	24	面谈
6	SF	公务员	男	27	面谈
7	SG	国企职工	女	26	面谈
8	SH	私企技术专员	男	27	面谈
9	SI	互联网企业职工	男	26	面谈
10	SJ	社群粉头	女	21	语音通话
11	SK	私企职工	男	27	面谈
12	SL	研究生在读	女	23	语音通话
13	SM	海外留学生	男	20	语音通话
14	SN	研究生在读	男	24	面谈
15	SO	本科生在读	女	19	语音通话
16	SP	全职主妇	女	39	面谈

三、截屏文本：视觉可显见下的“感知为真”

本部分将讨论，作为一种直接可显见的表层“文本”时，截屏如何被“信以为真”。研究发现，文本依托的媒介技术生成了物质隐喻，文本内部的符号框架构成了视觉转喻，它们在“文本”维度形成一种“真”的感觉。鉴于媒介技术和符号框架在视觉上是可显见的，它们共同在接收者的视知觉层面召唤着对“截屏为真”的解释，即“感知为真”。

（一）媒介技术：对截屏为“真”的物质隐喻

由于截屏技术在移动终端上的高嵌入性和使用的便捷性，我们似乎早已脱敏，总在不经意间按下“快门”，完成截取。就像受访者SD、SE均表示：“一打开相册，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竟然截了这么多图，而且好多还是没啥用的。”可我们几乎未曾省思，技术为何如此自然地主导着我们对它的理解，对符号文本的记录为何被冠以“截屏”“截取”之名，我们借助技术完成这一操作时，口中所说的“截了”到底缘何而来，是对操作的描述，还是一个高明的隐喻？对这一问题的省思，我们可以回到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海尔斯在研究媒介技术时指出，人们通常会采用物质隐喻（material metaphor）来理解自身所使用到的新技术，这与传统语言意义上的隐喻不同，即隐喻的建立并非是用一个词根去暗喻另一个词根，而是产生于符号与物质设备之间，这个隐喻有能力让事情发生在现实世界中[23]。既然物质隐喻产生于符号文本和物质设备，我们不妨对截屏文本所依托的物质设备（媒介技术）做一个鸟瞰式的考古。

如前所述，截屏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医学中“X”光的运用，由于“X”光影像以胶片转换为图像文本的成本较高，便有医生采用相机对着“X”光所在的屏幕进行拍摄，再洗出照片。这一方式在德语中被称为“屏幕摄影”（Schirmbildfotografie）[24]，即是截屏文本的早期形态。这种对着屏幕拍照的方式，因物质设备（照相机）以精密的光学元件和直指现实的镜头装置作背书，使早期的截屏文本具有了纪实性的特征，其目的是对客观现实进行“拍摄”和“复制”，具有“所拍即所见”的隐喻。60年代交互计算机的出现，使截屏操作从相机快门

转向了计算机按钮。此外，依托于传真机实现对纸张界面的“截屏”也拥有实证性和证据性[25]。此时，截屏的技术装置依然依托于独立的光学元件系统。到了21世纪初，截屏逐渐成为个人计算机和移动终端的标配，慢慢脱离单纯的光学技术，筑基于由“0”和“1”构成的数字技术，操作也由单一的快门键变成了多按键组合。但访谈结果显示，对摄影、摄像和传真机等物质设备光学原理的“抛弃”并没有削弱它们对截屏的影响，即是说，个人计算机和移动终端上的截屏技术，继承了早期物质设备的诸多特性：截屏图像模拟了照片的外形、手机截屏的“快门声”、截取瞬间屏幕的“闪白”、按键的“快门感”等，它们共同构成了通往“拟真”的物质隐喻之路，使接收者感知为真。

截屏的那个快门声音，会让我感觉像是在拍照，有时候感觉“拍一个”和“截一个”没啥区别。（SF）

截屏的时候，屏幕会闪白一下，跟照相机开闪光灯一样。（SD）

我手机截屏要同时按下“锁屏键”和“声音键”，再配上声音，按下去的时候确实会有按相机快门的感觉。（SH）

不难发现，截屏依托的物质设备一直在发展变化，但其对真实的“模拟”、对现实的“拍摄”的物质隐喻却一直继承至今。正如章戈浩所说，“物质隐喻所强调的是某种数字技术是被当作什么事物来使用”[26]，我们的确常借助照相机、摄像机、计算机等物质设备去理解截屏，将截屏技术视作“向内自拍”的工具，在屏幕内部瞄准对象事物进行“拍摄”。总之，对机械设备和光学规律的搁置，使“拍”的对象由外部世界转向屏内世界，“向内自拍”成了“向内截取”，“所拍即所见”也成了“所截即所见”，“截”暗喻了“拍”，我们仍在“拍摄”屏幕，只不过被冠以“截取”“截屏”之名。具体实践中，截屏的物质隐喻还诱惑着我们去生成自己所需要的“真实”，形成了“因为是截的，所以是真的”的认知逻辑。

之前回学校忘了带学生卡，门卫大爷就说“你截个图给我就行”，我就拿手机在他面前绕了一下，他也不在乎你的截图内容具体是什么。（SC）

现在热搜上一旦出现什么绯闻，一部分网友在评论“要实锤就把截图放出来”，另一部分又说“人家都把聊天截图放出来了，你们还要怎么样”，好像默认了只要截屏，就必然会有真相似的。（SG）

我把防疫码截个图，小区保安会相信是真的，但我要是把防疫码画出来，画得再逼真，那人家也会觉得你在搞笑。我觉得是因为它是用手机完成的，跟拍照一样。（SI）

可见，截屏的物质隐喻是如此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不过，人们忽视的是，照相机、摄像机、传真机等依托于光学规律的技术实现的是对自然世界的拍摄，但截屏技术所完成的是对“0”和“1”的截取，其“可编辑性”远高于前者。但正是在物质性接续向前发展而隐喻性不断继承的错位共谋中，接收者以过去的物质隐喻来理解如今的截屏，文本便被“信以为真”。

（二）符号框架：对截屏为“真”的视觉转喻

约翰·伯格（John Berger）曾言，行动主体在浏览图像时，“观看先于言语”[27]。这一论断将我们引向了一个视觉修辞的问题。对图像视觉修辞问题，学界经常以“框架”作为讨论的重心，如甘莅豪从框架形成的认知路径指出，视觉图像常见的修辞方式有三种：场景分割、视觉注意、空间拓扑，它们影响着接收者对图像的解读[28]。截屏文本作为一种图像，同样以“框架”制约着接收者的认知，如杜璇、刘于思注意到截屏会产生“框架效应”，触发断章取义式的真实性观念。但问题是，框架是如何让我们产生所谓的“真实性”观念？图像文本的框架与接收者的认知又有何关系？

其实，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界定“框架”概念之际，就已指出，框架实质上是一种“图式”[29]。图式是一种心理认知结构，是“一种把握对象特征的算法体系”，“为认识活动提供了一种‘加工’依据，使得我们的知觉过程变得有‘章’可循”[30]。简言之，

图式是人脑自带的“认知拼图”，在行动者的视知觉与认知对象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我们对对象产生的视觉认知，只不过是图式结构的“再现”。

研究发现，接收者面对截屏，首先会识别文本内的突出信息，这种突出的视觉性符号作为一种“刺激物”，唤起接收者头脑中的特定图式，使其在符号文本与感知解释间发挥勾连作用。不过，作为符号文本的“刺激物”并不必须与图式完全契合，仅需局部相符，便会引发我们形成对事物全貌的感知。原因在于，在“启发性认知机制”作用下，人们常依赖局部线索形成存有感性成分的对于全貌的判断，而理性意识的缺位，让人很容易将视觉对象按照图式结构“粗略加工”为某种“现实”。也即是说，截屏文本的视觉轮廓，就是图式结构的“意向性再现”，容易让接收者形成一种“真实”的感知。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所言，“突出的标志不仅足以使人把事物识别出来，而且能够传达一种生动的印象，使人觉得这就是那个真实事物的完整形象”[31]。这种能够让人对截屏产生真实感知的“刺激物”通常为日常生活中接触频繁且使用率高的要素，如聊天记录中的头像、昵称、对话，又如时间、日期、二维码等。这类符号形式自身作为框架，因在交往中复现的高频率和图式机制的运作，使人脑很容易在截屏文本与现实生活间建立联系，并认定截屏文本的“真实性”。这种在本体和喻体间建立联想关系的过程，即为视觉转喻。

每次在手机上打开那些聊天记录的截屏，不说消息内容，光是里面那些头像、昵称就让我有一瞬间觉得好像是我自己在发消息似的。（SD）

我之前遇到过诈骗的，给我发了一些所谓的流水单截图，上面有具体的年月日、时间点和金额，有零有整的，我第一反应就觉得是真的，最后微信弹出来了风险提示我才及时止损，不然可能真被骗了。（SA）

有趣的是，作为“刺激物”的符号不仅会让接收者解释为真，还会被发出者有意利用，生成“希望他者解释为真”的期待，如受访者 SF 所述：“有一次在节假日我被安排去加班，我下午五六点就走了（下班）。但我特意截屏了一个晚上八点的打卡记录，把时间漏出来，然后在九点的时候发朋友圈，希望领导看到之后会觉得我很辛苦。”这同样反映了截屏文本的转喻修辞特征：当传者意图让文本具有被受者“信以为真”的潜力时，由于意图难以直接表达，便借由符号文本的在场，实现“以局部代整体”的视觉转喻，进而呼唤“真实”的抵达。而这种视觉转喻之所以能够成立，关键在于图式的认知结构搭建起了符号文本与视知觉的联想关系。

此外，截屏文本自身也构成一种“刺激物”。行动者对截屏的风险想象，营造了截屏独有的特质：发送截屏让自身的言行举止存在被公开的风险，“不愿发送”是一种合理的警惕性行为，“乐意发送”意味着“信任”和“真诚”。这种特质会被解码为“基于信任关系发送的截屏，不会有假”，它刺激着接收者对传受信任关系的识别，并将这种信任关系纳入到文本解释中，形成对截屏为“真”的图式认知。相比之下，广告和新闻等文本就缺乏这一特质，发送广告或新闻甚至会被当作没有诚意的“群发”或“骚扰”。

截屏这东西很私密的，对方愿意截屏发给我，至少证明别人很实在，是信任我的，那我自然会信，一般不会一上来就质疑对方在欺骗我吧。（SG）

我一般不主动发截屏，要是发了就意思比较信任对方。我看到别人给我转发某个截图，说明对方做好了承担某些风险的准备，还是比较真诚的。（SA）

综上，截屏文本在符号维度上的表意方式并不在于通过具体的言语去说服接收者，而在于文本的视觉形式“存在于此”，即是说，符号文本并非仅通过所指传递意义，还在于促使接收者在能指上不断“驻足”和“对话”。由此，符号框架不断在接收者的“大脑里唤起一种属于一般感觉范畴的特定图式”，以视觉修辞“去替代真实的现象”[32]。

四、接收语境：环境可感知下的“衍义为真”

文本、解释者并非存于真空，而是身处特

定“语境”中。本部分将讨论，“语境”作为能够被感知的环境氛围弥散于互动中层，如何介入解释者的释义过程，让人对截屏“信以为真”。研究发现，伴随文本在“文本间”促成了意义的互文生产，场合语境在“文本外”框定了语义边界，共同锚定了对“截屏为真”的解释。这种“真”并非文本表意的直接结果，而是源于解释行为落入的新语境所引发的衍义实践，即“衍义为真”。

（一）伴随文本：对截屏为“真”的互文指涉

“伴随文本”是赵毅衡教授基于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瑞恰慈的“语境论”，以及热奈特、费斯克等人的互文理论提出的概念，意指那些在文本之后、之外或边缘被“顺便携带”着的、“伴随着符号文本”的因素，它们作为一种语境积极地参与意义构成，甚至“决定了文本的解释方式”[33]。具体来说，伴随文本可分为副文本、型文本、前文本、同时文本、评论文本、链文本和先/后文本七小类，按照显隐与否、表意的先后过程又分为显性伴随文本、生成伴随文本和解释伴随文本三大类。但李玮、蒋晓丽指出：“所有伴随文本都对文本的接收与解释产生作用，都呈现出‘解释性’特征。”[34]本文暂时悬置对伴随文本的分类问题，而是通过访谈去寻找可能影响截屏真实性解释的伴随文本。

访谈发现，一方面，副文本和型文本经常落在文本边缘，直接参与文本的意义构成与解释。副文本常作为“框架因素”出现在截屏文本表层，常见的有三类：一是，截屏文本发出者的身份、地位与信度——鉴于不同发出者在风格、权威性和垂直度上的差异，同一截屏由不同的人发布，会产生不同的真实性解释；二是，文本注释、标题和说明文字，尤其是将一些权威信源标注为文本的注释或标题时，会影响截屏文本的真实性解释；三是，文本内部的水印、盖章，同样会影响文本的真实性解释。

卓伟发的截图去“实锤”那些顶流，我必信！但那些连实名认证都没有的人，用一个小号去“锤”别人，这些截图我还是得掂量掂量。（SH）

好朋友、家人、老师这些人给我截图，我会相信是真的，他们是不会骗我的。（SL）

之前有“瓜”爆料某运动员包养球迷，注释图片来源和水印上写了“中国体育报”，我就觉得还挺可靠的。后来才发现，那是营销号乱写的。（SJ）

型文本作为文本与文化体裁的中介，指明了文化背景规定的文本从属集群，帮助解释者明白文本的体裁类别。截屏文本的型文本范畴主要是两类体裁：新闻报道和法院卷宗。新闻和卷宗作为一种纪实性体裁，决定了表意与解释的基本程式，即是说，接收者会按照解读新闻、卷宗的程式规范去理解其中的截屏，将体裁带来的纪实性“拓印”到截屏上。如此一来，无论截屏真实与否，都会被接收者看作为真。

经常在新闻上看到一些截图，我就想：既然新闻都报道了，那这截屏总是假不了吧。（SE）

之前在法院实习，当事人拿截图当证据，后来又被写进卷宗里，这时候的截图无论如何都得被看作是真的了。（SB）

另一方面，评论文本和链文本经常隐藏于文本背后，参与文本的意义解释。具体来讲，评论文本指的是对文本的评价，在截屏引发的网络舆论中极为多见，主要体现为各大社交平台中对原文本的留言评论、二次创作等。当截屏文本的评论文本达到一定数量时，会形成类似于“沉默螺旋”的力量影响接收者对截屏的看法。链文本指那些有意或无意地与原文本“链接”起来的其他文本，比如某些营销号为了吸引流量，提升所发布内容的信度，往往会在一些附有截屏的推文中，添加具有倾向性的超链接对文本进行辅助说明。与副文本和型文本显露于外围、具有明确的“指示”作用不同，评论文本与链文本隐藏于文本背后，凭借与原文本在事件、主题和人物上的某种相关性，暗暗指向原文本，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信息压力，具有隐晦的“引导”作用。

之前我看到霍尊和陈露的那些瓜（截屏），我开始是不信的，但好多网友在微博上发评论、在知乎问答里面写分析，头头是道，看多了就发现我好像被他们同化，也就信了。（SE）

营销号在爆料那些娱乐八卦的时候，先配

几张截图，接着底下密密麻麻的链接，这些链接对应着图里的内容，看完之后让你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SC）

综上，显露于文本表层的副文本与型文本预设了文本解读的角度；隐藏于文本背后的评论文本和链文本引导着解释者的解读。二者共同推动接收者的衍义实践，生成了“信以为真”的解释。这也意味着，过于热衷伴随文本语境，可能会以先入之见取代个人的独立思考，甚至引发舆论风险，这在诸多由截屏引发的公共事件中已经得到验证。

（二）场合语境：对截屏为“真”的语义框定

如果说，伴随文本构成了“内部语境”，那么场合语境/情景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则构成了“外部语境”，文本处于不同的“场合”与“范畴”，“意义可以完全不同”[35]。场合语境中语义生产受文本自身制约较弱，更多取决于文本涉及的主题、携带的话语以及空间环境等。譬如，“六月飞雪”本指一种奇特的自然现象，但在“窦娥临死发誓”的场合中，便被解读为冤屈之意。因此，应回到截屏文本发生的场合中，理解截屏何以被“信以为真”。访谈发现，“议题场合”与“话语场合”框定着截屏文本的语义生产，影响着接收者的衍义实践。

首先，“议题场合”指的是围绕特定主题事件或公共话题铺设的语义场，它带来了超越文本的释义规则，成为理解文本的背景。2013年，时任河南省沁阳市公安局原纪委书记张学林遭遇车祸身亡，事发后，质疑监控失灵、指认勘查记录作假的截图在网上流传，引发热议。2018年，“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中，脚穿高跟鞋的女司机将车逆行停在路边的视频截图被广泛传播，引来大量网民的“口诛笔伐”……在上述公共议题中，“监控视觉符号的离场”和“回应的迟缓”建构了一种“视觉危机”和“话语缺席”的场合语境，恰好，截屏作为图像符号被认为是舆论场中“最具争议宣认效应的符号”[36]，便以“替代性真相”的身份迅速占据舆论场的中心地位。同时，对视觉图像的依赖促使人们去“接纳”这些截屏，即“信以为真”。这表明，议题重构了场合语境：对话模式转为冲突模式，法制逻辑转为抗争逻辑，截屏文本在其中生发衍义与想象，升格为一个逼真的修辞问题，其语义裁定必然超越文本自身。反之，若监控在场，警方快速回应，媒体集体发声，那么，截屏文本就落在了由对话模式和法制逻辑主导的语义场中，更容易被解读为对官方的诬蔑、对媒体的冒犯。

19年年底，各种假截图满天飞，媒体不发声、部分官员不说话，所以就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要是早点公布消息，发布准确数据，我也不会天天去网上求助那些小道消息了。（SN）

MSU（密歇根州立大学）发生枪击案那阵子，我们学校各种群里流传“某地出现枪手”之类的聊天截图，虽然后来警察证实了好多都是假的，但我真的会信啊，毕竟学校刚出过事。（SM）

其次，“话语场合”指的是依靠特定话语形式而形成的释义规则。截屏文本作为公共事件的载体，经常落入某些话语所建构的意义场域，话语作为一种语境压力会不断压迫接收者的衍义实践趋近于场域既定的价值观念，使得文本被“信以为真”。具言之，引导解释者衍义实践的话语通常包括性别话语、阶层话语、民族话语和国家话语等。如，以女性为主体，呼吁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说出惨痛经历的“MeToo”运动，营造了一种以“发声文化”为核心、以性骚扰为抗争对象的话语场合，为女性话语表达赋权，以使其精心建构的“发声文本”获得合理性。截屏作为“发声文本”的载体，出现在这一情境中，自然也被合理化、正当化。再如，网络民族主义话语中，那些迎合了拼贴、戏仿视觉风格，通往国家认同的截屏会被信以为真，以至于有学者称其为“图像驱动性民族主义”（image-driven nationalism）[37]；而网络民粹主义话语中，那些颇具抗争性和讽刺性的截屏更容易被信以为真。在这个过程中，话语场合为截屏框定的释义规则会在传播过程中被反复确认，正如刘涛所言，话语场合中视觉文本的出场总是“携带着某种稳定的符号特征”，并且还会“深化既定的话语内涵”[38]，而那些不符合这些规

则的解释可能会被看作“异端”。

“MeToo”运动时期，大量女性贴出证据来为自己发声，这时候曝光的截图几乎没人会怀疑，但要是放到几年前，可能没多少人会关注，也没多少人会信。（SA）

现在反腐倡廉搞这么浩大的，还是有一些贪官没有被抓，网上一旦出现那些曝光他们的截图，像什么包养、受贿之类的，就得赶紧抓住这苗头把那些“蛀虫”拔掉。（SL）

多年前“帝吧出征”那阵子，好多同胞发回来了一些外网的图，只要跟保护中国、怒撕“港独”“台独”有关的截图，都会被当作真的，而且转发和评论量特别高。反而，你要是不信，“吧友”就会怀疑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SG）

综上，特定的议题与话语作为外部语境压力，规约着视觉文本的意义生成与释义走向，迫使接收者不断朝着“信以为真”的方向开展衍义实践。即是说，文本落入特定语境后，文本表意与接收释义具有极强的浮动性和不确定性，语境会越过文本主导其释义过程。若解释者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便会越发脱离文本，由语境裹挟向前展开意义实践。

五、解释者：资源可调用下的“认同为真”

无论文本、语境如何变化，最终都要汇聚于解释者。本部分将讨论，处于接收端的解释者如何在解码文本时获得对截屏文本的信任。研究发现，一方面，解释者凭借能力元语言完成经验与截屏文本的接合，获得对文本的认同；另一方面，社群文化身份以情感作为纽带，引导解释者逐渐认同文本。无论个体经验接合，还是社群情感引导，都根植于行动者对解释资源的调用，进而落脚于对文本的认同，即“认同为真”。

（一）个体成长经历：对截屏为“真”的经验接合

元语言（meta-language）就是符码的集合，是解释语言的语言，是通往释义规则最底层、最基本的“规则合集”。赵毅衡教授指出，元语言可分为三类：自携元语言、语境元语言和能力元语言。如果说前文所述的文本和语境分别构成了自携元语言和语境元语言，是冰山之上的一角，可以被轻松感知，那么，解释者的能力元语言则潜藏于冰山之下的幽暗中，难以被识别，但依旧暗流涌动，意指“来自解释者的社会性成长经历”，包括“文化修养”“解释经验积累”“相关文本的记忆”和“感情和信仰”[39]等。访谈发现，有两种能力元语言规约着接收者对截屏文本的解释：显意识层面的个体经验、潜意识层面的个体情感。

第一，在显意识层面起作用的个体经验。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指出个体对经验世界体悟构成了“经验基模”，它涵纳了过去各种体验的“意义脉络”，经常以“知道某事物”或“已知道某事物”的面貌出现，当面对一个新事物时，个体“就根据这些基模加以诠释”[40]。一面，解释者自身过往的经历、既有立场态度、生活经验等作为“（已）知道某事物”构成了他们解码截屏的“经验基模”。另一面，截屏文本与日常生活有着高度关联性和浸润性，经常超越文本形式自身，携带大量与“经验基模”相耦合的内容。那么，这些截屏就很容易被那些具有类似经历的人所识别，借过往的经验对文本展开解释、赋予意义。于是，文本迎合经验，经验接合文本，二者互嵌则解释为真。

值得一提的是，文本和语境作为元语言，暗示了接收者的解释方向，但最终的解释是否服从它们，还在于接收者的经验。譬如，面对网传“西安中考回流生”的截图，非考生家长并不必然将其视作为真，而考生家长却深信不疑，还将非考生家长的劝阻看作“风凉话”，原因在于前者缺少“孩子中考”这一经验，而后者恰好具备这一条件。此外，不同于同样凭借经验唤起的图式心理，图式只是经验的视觉轮廓，是对“刺激物”的刺激式反应，而经验基模强调的是对某事物的完整经验，可引发有意识的反应。

最近网传“4w河南考生来西安参加中考”的截图火爆全网，我身边好几个中考生的父母都信了还到处转发，我其实也当真了，我家娃明年也就要参加中考了，其他那些自家孩子近期不参加中考的朋友都劝我别信，净说“风凉话”。（SP）

我家里去年刚在西安买房，现在听到看到

那些有关楼市不稳、房地产不景气的聊天截图，就很容易相信。（SB）

第二，在潜意识层面起作用的个体情感。在后真相时代，鉴于截屏操作的随意性、文本的可编辑性以及核查文本的复杂性，理性的判断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潜意识中的感性反应或直观感觉。对此，以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的符号三元关系来看，情感解释项作为符号第一性，其获得方式不在于判断和理解，而在于直观[41]，情感解释是解释者对截屏产生的最直接感觉。不同于经过层层把关的新闻文本，对于随手一截且缺乏多方信源验证的截屏文本来说，当主观情绪取代事实核查成为解读文本的依据时，无论文本意义的解读有多少种可能，解释者都只会凭借个体情感或信仰做出极具个人化的解读，选取自己最愿意相信、最乐意认可的路径，在意义层面上解释为“真”。这种个体情感通常来自于性别、婚恋、学历、民族、宗教和国家等参数，个体凭借不同的情感经验，做出差异化的“个体阐释”。正如皮尔斯所说，“符号自身会产生一种感觉……其中的事实基础非常薄弱。我将这种感觉称为‘情绪解释项’……在某些情况下，它就是某些符号能够产生的唯一意指效力”[42]。

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网上截图说女司机穿高跟鞋一定是肇事者，我第一反应认为是真的，但我女朋友就觉得是假的，她觉得是大家对女性有刻板印象。不过对于那些男性家暴女性的截图片段，她会第一反应是真的，而我又会有迟疑。（SN）

现在有好多黑韩国、日本的外网截图传到国内，说什么“偷国”，我还是很愿意接受的，之前他们就经常黑我们，说中国人偷他们的传统文化。（SM）

个体经验与个体情感作为能力元语言的不同在于，前者在显意识层面主导着解释，后者则在潜意识层面做主导。正如受访者SB、SP能明显意识到：我比别人更容易相信那些截图，主要是因为我有那些经历。而受访者SN、SM则认为：好像是下意识地就相信了。不过，这二者并非孤立隔绝，而是相互渗透，同时作用于解释者的释义过程，经验中必然牵涉情感，情感也依附于经验。

总之，不论是显性能够被意识到的经验，还是隐性难以被直接识别的情感，它们都是个体的成长经历，都源自于个体深处记忆、惯习、情绪等的叠加，这是一种历时性的积累，最终沉淀为相对稳定的经验格式塔。具体到意义实践中，这些具有差异性的经验能够被解释者调用进解码过程，与文本相接合，获得对文本的认同，若将个体经历剥脱开，解释者析出的意义将混沌如星云。

（二）社群文化身份：对截屏为“真”的情感引导

本真性源于接收者的解释，意味着截屏文本并不必须符合客观事实，只需要在解释者那里得到一种有关“真”的认知，这是“真知”而非“真相”。皮尔斯在讨论真实的时候，用了“真知”（truth）的概念，意指“一个科学探究社群长期依据科学方法，最后所共同同意的信念或意见”[43]。即是说，判定为真的标准，既不在于客体事实，也不在于个人认定，而在于社群的认定。可见，“信以为真”的信念可以是社群互动探究的结果，而社群指的是那些拥有相同的目标、行为规范和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群体，他们对某一文本解读出的“同样的意义”即为社群真知。可以说，解释者对截屏之“真”的认定，是依据过往的志趣、背景和文化身份，接受并认同文本，获得“一致同意”的认知。就像受访者SJ、SK均表示：那些截屏到底是不是真相也许不重要，有时候更看重的是我们自己人怎么说。

访谈发现，解释者通过与社群的互动，能够将某种共同的观念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内化为价值取向，强化对社群的认同。接着，将对社群的认同，转移为对截屏的认同，形成“信以为真”的信念。这一过程经常由解释者与社群的情感联结来引导实现。具言之，社群成员通过互动仪式促进情感联结与凝聚，形成“自己人”的文化身份，进而产生“我们”的情感团结；在情感动员的机制下，“个体或群体通过情感运作，以唤起、激发或改变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评价”[44]，引导成员按照符合集体情感的路径完成解释，更

要求其对迎合群体情感的文本持信任态度，甚至演化为“情感绑架”，将不遵循此解释路径的人视作“外人”。如，前不久传出“TFBOYS十年之约演唱会将落地西安”的截图，微博超话中，团粉多持信任态度，积极参与宣传，并将对此持怀疑态度的成员斥为“伪粉”，而唯粉和非粉的态度模棱两可，这是缘于前者所在的社群提供了强烈的情感认同，后者则支持不足。正如受访者SJ对此的评价：“你不信十年之约，还敢说自己是团粉。”而那些称组合中某人要“单飞”的截图，又会引发对应唯粉社群的强烈信任。有趣的是，负面情感也会引导接收者对文本产生“信以为真”的信念。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曾提出的“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的概念，指“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45]，说明认同可以来源于社群成员共有的对立情绪。如“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式期间，网传截图帖显示某大V称“日韩出场无一人鼓掌”，该帖评论区几乎无人质疑文本真实与否，甚至有网友称“没看开幕式的我都料到这一幕了”。这是源自于中日韩多边关系仍存在波澜与分歧，社群成员将共享的负面情感代入文本解码中，不会产生对“真”的怀疑。若反之，将涉事主体置换为与中国睦邻友好的国家，也许是另一种景象。

此外，文化认同、身份认同、职业认同等，亦能促成对截屏文本的认同，但它们通常落脚于情感上得到确证。譬如身份认同，社群为成员赋予的身份以制度化的形式规定着成员的行动和认知逻辑，要求成员按照符合身份定位的制度化规范展开解释，这种身份规范能够制约解释的前提是，社群成员投入了情感，若非如此，可能也只是“貌合神离”，空有一个身份，不足以形成“我们”的情感和认同。

其实在外面留学的人就是一个圈子，每次看到那些宣扬我们国家的截屏，很多当地人会觉得我们在鼓吹，但我们会默认那是真的，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要是有人不信还出言不逊，可能会被认为是“异类”。（SM）

粉头、站姐发的那些宣传我家爱豆的截图物料，即便是“包浆截图”我们也会相信而且还大力宣传。如果是曝了对家的黑料，那我们更毫无保留地相信。（SO）

大家愿意相信中国电科“截屏门”事件，主要是因为经常遇到劳动权益不公的事情，都有负面情绪了。其实不光我这么觉得，只要你是“上班族”“打工族”的一员，那你多少都会信。（SK）

综上，只要文本表意满足社群内部情感和文化身份的要求，即使不符合客观事实、内部缺乏融贯，也可能让解释者对文本产生认同，促成“信以为真”的信念。这种“真”并非个人意志的结果，而是凭借解释者与文化社群的情感联结，获得群体规约，遵循内部既定的解释路径，逐渐对文本产生认同，如果不能达及认同，可能面临被社群“驱逐”的风险。不过，这种认同背后也存在着“群体极化”的风险。

六、结语：以怀疑式姿态，打破“解释行为的殖民化”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曾言，在理解一件事物之前所理解的各种观念构成了影响甚至决定我们认知的“前知”（fore-conception），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也认为“前知”会直接作用于阐释，甚至直呼“所有的意见都是偏见”[46]。这一“前知”或称“前理解”，“是我们的历史性存在方式，它决定了我们在进行阐释时总是从某一视域、境遇出发……它对阐释会形成制约乃至宰制力量”，当权力等外部因素介入后，更会引发“强制阐释”[47]。从传播符号学的理论视野切入，便会发现，对截屏“信以为真”的信念，也是身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行动者基于作为个人“前知”的特定历史文化所创造出来的，它源于接收者对“真”的感知，而非对客体事实的确证，它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本真”，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真实”，它受制于人类存在方式的历史性、文化性，而非与生俱来。

进一步来讲，文本、语境和解释者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颇具“前知宰制”意味的解释系统，所谓的真相，永远是经过解释系统结

构性或程序性处理过后被再现的“真”，而这种解释系统是由我们对外部社会的“前知”构成。过去，我们经由“体验”获取“所知”以建构真实，如今，在海量化信息传播与抽象化教育模式的双重作用下，“前知”往往先于“体验”甚至跳过“体验”而直接抵达所谓的“真实”，以至于“我们得到越多的所知，真实反而被消灭得越严重”[48]。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指出，体制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带来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同样，如今解释系统的运作逻辑取代“体验”成为个体认知与社会交往的核心，不断以“前知”介入甚至主导解释行为，造成了“解释行为的殖民化”。

这意味着，无论是面对截屏、录屏还是录音，身为解释者的我们都面临着深刻的解释危机：人的阐释方式及意义获取被先在于“体验”的解释系统所深度捆绑，人类所生产的“前知”反过来“殖民”了我们的解释行为，这颇具卡尔·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意义上的“异化”色彩。正如我们信任截屏，是因为“前知”了相机对真实的再现，“前知”了卓伟的名气，“前知”了社群的情感意图，而非“体验”文本的结果。“体验”的缺席，使得我们的历史文化因素以及其他的外部权力因素，可以通过入侵“解释系统”的方式来操控我们的认知。而解释系统深植于我们身体内部，使我们既难以内观自省又难以与系统完全剥脱，这进一步加剧了解释系统对解释行为的“殖民”。与其被动受到操控，成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口中的“幻影公众”，不如主动去“体验”，成为具备数字素养的建构者。这要求我们回过头认真“检视”文本，就像胡塞尔现象学的口号所倡导的那样：“回到事物本身”。

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指出，在更难看见“真相”的信息超载时代，我们需要具备“怀疑性的认知方法”，文本是否可信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了开放和怀疑的思维”[49]。即是说，“体验”某一文本时理当多一些合理的“疑心”。第一，意识到文本被“信以为真”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具有过程性和相对性，个体认知容易受到“前知”的影响。第二，始终对文本保持警惕、谨慎，积极参与内容与信源的核查，以“系统性认知机制”的方式从整体、逻辑和系统的维度审视文本内容，避免狭隘的经验主义和语境陷阱，寻求与多元主体的公共对话。第三，看到文本背后的结构性力量，保持对“技术价值无涉”话语的警惕，就像马克思精神交往论揭示的那样，无论媒介技术如何强大，其本质都是一种精神生产的结果，必然受到物质生产关系的制约，因此必须重视文本或技术背后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和意识形态色彩。面对信息化与媒介化社会下的“解释行为的殖民化”现象，这样的内省式思考也许并不必然让我们抵达真实，但相对于下意识地靠拢“前知”而放弃“体验”的消极态度，抱持积极主动的怀疑式姿态，要有价值得多。

参考文献

[1] 北京日报客户端.调查丨涉疫谣言频频传播,都传啥?用啥传? [EB/OL]. [2021-08-10]. https://bj.bjd.com.cn/5b165687a010550e5ddc0e6a/contentShare/5b16573ae4b02a9fe2d558f9/AP61120282e4b0f21db07b2364.html

[2]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伪造“商户辱骂外卖小哥”截图引发网暴，武汉网警依法处置! [EB/OL]. [2023-05-09].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6305569303718723&wfr=spider&for=pc.

[3][24] Gerling W. Photography in the digital: Screenshot and in-game photography[J]. *photographies*, 2018, 11(2-3): 149-167.

[4] Allen M. Representing computer-aided design: Screenshots and the interactive computer circa 1960[J]. *Perspectives on Science*, 2016, 24(6): 637-668.

[5] 宋美杰, 陈元朔. 为何截屏: 从屏幕摄影到媒介化生活 [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1): 123-132+171.

[6][16][25] 汪润，靖鸣. 媒介演进：截屏和截屏图片的人性化趋势与功能补偿——以保罗·莱文森媒介进化理论为视角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7)：155-161.

[7] 韩传喜，郭晨. 基于截屏界面的媒介实践与空间转向研究 [J]. 江西社会科学，2023，43(3)：179-187.

[8] 庞晨，陈孟南. 浅析截屏图片的功能、特征与风险 [J]. 新闻爱好者，2020(01)：94-96.

[9] Jaynes V. The social life of screenshots: the power of visibility in teen friendship groups[J]. *New Media & Society*, 2020, 22(8): 1378-1393.

[10] 刘战伟，李媛媛，刘蒙之. 圈层破壁、知识流动与破圈风险——以截屏与录屏为例 [J]. 青年记者，2020(18)：18-20.

[11] 王昀，王艳华. 数字交往的档案化及其可见性管理：线上用户的截屏实践分析 [J]. 新闻大学，2023(1)：75-86+121-122.

[12] 刘海明 . 在线信息交流中的截屏传播与伦理考虑 [J]. 社会科学战线，2023(6)：169−179.
[13] 张爱军，朱欢 . “截屏”社交的权力异化：逻辑、风险及其规制 [J]. 新视野，2021(4)：109−114.
[14] 李欢，徐偲骕 . 隔“屏”有耳？——聊天记录“二次传播”的控制权边界研究 [J]. 新闻记者，2020(9)：74−84.
[15] 靖鸣，梁雷 . 基于边界管理理论的截屏图片传播伦理失范及其思考 [J]. 中国出版，2022(9)：44−48.
[17][19] 杜璇，刘于思 . 截取即“框架”：过程视角下截屏的本真性反思及其技术意识形态 [J]. 南京社会科学，2022(11)：129−138.
[18] Frosh P: *The poetics of digital media*[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8: 62.
[20][21][33][35][39] 赵毅衡 .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 [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42;178−179;139;179;228.
[22]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 .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M]. 何文忠，译 . 上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97−199.
[23] Hayles N K, Burdick A. *Writing machines*[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22.
[26] 章戈浩 . 网页隐喻与处理超文本的姿态 [J]. 国际新闻界，2020，42(11)：25−38.
[27] 约翰·伯格 . 观看之道 [M]. 戴行钺，译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4.
[28] 甘莅豪 . 图像的谎言：符号交际视阈下的视觉修辞行为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0，57(2)：15−26.
[29]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21.
[30] 刘涛 . 图式论：图像思维与视觉修辞分析 [J]. 南京社会科学，2020(2)：101−109.
[31][32] 鲁道夫·阿恩海姆 . 艺术与视知觉 [M]. 滕守尧，朱疆源，译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50;54.
[34] 李玮,蒋晓丽 . 试对“伴随文本”理论进行修正与扩展——与赵毅衡教授商榷 [J]. 甘肃社会科学，2012(4)：251−255.
[36] 张伟 . 符号互文、情境衍义与文化规约——当代视觉修辞的语境参数及其意指实践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3(05)：156−163.
[37] Qiu J L. Go Baobao! Image−driven nationalism, generation post−1980s, and mainland students in Hong Kong[J].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2015, 23(1): 145−165.
[38] 刘涛 . 语境论：释义规则与视觉修辞分析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55(1)：5−15.
.[40] 阿尔弗雷德·舒茨 . 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M]. 游淙祺，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10.
[41] 彭佳 . 从符号现象学出发论想象 [J]. 符号与传媒，2017(2)：42−53.
[42] 赵星植，彭佳 . 论风格与情感、修辞之关系：一个皮尔斯解释项三分路径 [J]. 学术界，2018(1)：105−112+286.
[43] 赵星植 . 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 [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127.
[44] 白淑英，肖本立 . 新浪微博中网民的情感动员 [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39(5)：60−68.
[45] 肯尼斯·博克 . 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 [M]. 常昌富，顾宝桐，译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61.
[46]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 真理与方法 (修订本) [M]. 洪汉鼎，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488.
[47] 陶东风 . 从前理解、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 [J]. 学术研究 ,2021(10):16−23.
[48] 郑作彧 . 我们这个马赛克照片世界：当代真实的社会建构形式 [J]. 广东社会科学，2021(01)：181−194+255.
[49] 比尔·科瓦齐，汤姆·罗森斯蒂尔 . 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 [M]. 陆佳怡，孙志刚，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34.

Why Screenshots Are Believed To Be True: An Examination of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Li Wei, Liu Xingao

Abstract: The widespread circulation of screenshots in interpersonal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depends on the actor's belief that the screenshot is "true", that is,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screenshot.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essence of screenshots is "symbolic text" and its "authenticity" is an explanatory result,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and regards the "authenticity" of screenshots as the produ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xt", "context" and "interpreter". First, the media technology and symbolic framework visible in the text dimension make the screenshot "perceived as true" by the way of material metaphor and visual metonymy; Secondly, the co-text and situational context that can be perceived in the context dimension are "derived as true" through intertextual referential and semantic framing; Finally, the individual growth experience and community cultural identity that can be invoked by the interpreter dimension are "recognized as true" through experience conjugation and emotional guidance.
Keywords: screenshot; authenticity; text; context; interpreter
Authors: Li Wei,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 Liu Xingao,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Northwest University.